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顾颉刚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顾颉刚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顾颉刚集/顾颉刚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2967-3

I. 顾… II. 顾… III. ①顾颉刚-文集 ②史学-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2907 号

责任编辑 冯广裕
责任校对 林福国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338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顾颉刚先生，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省苏州市人。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助教、讲师，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所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12月25日于北京病逝。

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上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便打下了旧学的根柢。在北大期间，又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思想得到解放，能大胆破除对于传统学说的迷信，并敢于将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等等与高文典册中的经学、史学置于平等的地位上作研究的题材。他承受了胡适“历史演进”的治学方法，结合自己平时对于戏剧、故事格局的认识，很快深入到古史古籍的研究中。在我国历代学者疑辨工作的基础上，于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

古史”观，推翻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在学术界引起一场大论战，从而改写了传统的古史。先生并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四个传统观念，以后再具体化为打破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个偶像，在此设想下写出一系列重要著作。先生的这一业绩，将古代的经典由人们所信仰的对象变为供人研究的史料，促成中国史学步入了新时代。先生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为《古史辨》陆续出版，由此产生了“古史辨学派”，在国内外学术界之影响历久不衰。

先生以民俗学材料印证古史，是其治学的一大特点。古史记载中本来包含着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相互冲突，难以在考古学上得到直接的印证，而借用民俗学的研究便可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以孟姜女故事来论证古史的演变，以考察东岳庙诸神以及妙峰山香会来探讨古代神道及社祀，以歌谣来论证《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创作，都是为古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且开拓了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最有分量的文章，“能够奠定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基础”（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20年代后期在广州中山大学期间，先生主编《民俗周刊》，创办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将民俗学运动由北京推进到南方。

30年代先生因在大学讲授《禹贡》，进而研究历史地理；又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由研究沿革地理转而侧重研究边疆地理与民族演进史。1934年春联合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为学生选题目、找材料、改论文，甚至将学生论文重作而仍以其名义发表。又成立禹贡学会，编印《地图底本》，出版《边疆丛书》，组织边地考察团。学会依靠先生的捐款、会

员的会费和社会的资助得以维持，三年中取得巨大成绩：胜友如云，成果剧增，“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堪称胜事”（韩儒林语，见《历史地理》2辑，1982）；其中《禹贡半月刊》每期字数由起初的二三万字增至14万，每期印数也由起初的500册增至1500册，内容早已超出学生习作的范围而成为社会上颇有声誉和地位的学术刊物。先生所创立的“禹贡学派”为历史地理这一新兴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才，影响深远。因此《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卷首曰：“我国当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在先生倡导下开展起来的。”

抗战期间，先生转入西北、西南，在考察边疆教育，调查当地民族与社会现状的同时，又以所见所闻之边疆风尚证中原古史，破旧立新，为民族考古学开了先河。

50年代起，先生在北京任历史研究所职，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并深入研究《尚书》，以数年之力撰写《〈尚书·大诰〉译证》，将校勘、训释、译述、考证相结合，涉及几乎所有的先秦古籍，吸取清代及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甲金文材料，成70万字巨著，体现了《尚书》整理研究的新水平，对商周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术界对此评价为“在《尚书》学史上还没有过先例”（李平心语，《历史研究》1962年5期），“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的“一生最圆熟的严谨之作”（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先生一生嗜学如命，为追求真理，不崇拜偶像，亦不加入任何家派，但求研究材料之正确而不辞劳苦，不贪名利，诚恳地欢迎他人的驳诘，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不遗余力地提携、培育后学。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1)
答刘胡两先生书	(9)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4)
《古史辨》第四册序	(108)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130)
“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	(172)
《尚书·大诰》今译(摘要)	(243)
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 ——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一	(283)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306)
九州之戎与戎禹	(325)
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	(343)

作者著述要目	(427)
作者年表	(437)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

* 此文写于1923年2月，自选其中一部分并加按语发表于同年5月6日《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9期，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又收入《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等。

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

个月做一篇文，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

这回适之先生到上海来，因为不及做《读书杂志》的文字，嘱我赶做一篇。我当下就想做一篇《论语中的古史》，因为材料较少，容易做成。但今天一动笔之后，又觉得赶不及，因为单说《论语》自是容易，但若不与他书比较看来，就显不出它的地位，而与他书一比较之后，范围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内赶得出的。因此，想起我两月前曾与玄同先生一信，论起这事，固然是信笔写下，但也足以说出一点大纲。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略）

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现在先对先生说一个大意，——我这些意思从来没有写出，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

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详见后。《尚书》里可疑的只有一个帝乙，或是殷商的后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样，加上的尊号，也说不定）。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

《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纘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纘”某人的“绪”。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到《閟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他为什么不说后稷纘黄帝的绪，纘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纘禹之绪了。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

关系。《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按《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汤以前国势本已发达，到汤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韦、顾、昆吾、夏桀打倒罢了。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二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

至于禹从何处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虺，象形。”虺，《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有了传统的观念，于是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书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尧、舜的故事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左传》是战国时的著作；《尚书》

中的《尧典》、《皋陶谟》也靠不住；《论语》较为可靠，所以取了它。）《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或者当时人的心目中以为各隔数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汤，汤和文、武之类，亦未可知。（《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论语》经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尧曰》篇的首章，在文体上很可见出有意摹古的样子，在宗旨上很可见出秉承“王道”和“道统”两个主义，是战国时的儒家面目。）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即以《诗经》证之，《閟宫》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閟宫》说后稷“缙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禹的同官。又以《论语》证之，（1）《论语》上门人问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废，何以孔子单单截取了五人？（3）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见禹、稷都是有天下的，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尧典》上说他“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说他“三朝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不相冲突吗？这些问题，都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我意，先有了禅让的学说而

后有《尧典》、《皋陶谟》出来，当作禅让的实证，禅让之说是儒家本了尊贤的主义鼓吹出来的。）作《论语》时，对于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们做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作了《尧典》等篇，于是尧、舜的“文章”都有实事可举了。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时，祭黄帝（见《汉书·郊祀志》。秦国崇奉的神最杂，名目也最诡，秦文公梦了黄蛇作酈时，拾得了一块石头作陈宝祠，实在还是拜物教。黄帝之祀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螾”之类），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子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春秋命历序》上说“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年”，于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万八千岁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这些胡乱伪造的史，《尧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诗经》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怀疑商以前的史呢！

这些意思如果充分的发挥，准可著成数十卷书。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即如后稷，周人自己说是他们的祖，但有无是人也不得而知。因为在《诗》、《书》